

朱彤文存

1

春华秋拾
(忆旧卷)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朱彤文存

1

春华秋拾 (忆旧卷)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彤文存 / 朱彤著.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472-1274-5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1366号

书 名	ZHUTONGWENCUN 朱彤文存
作 者	朱 彤
出 版 人	徐 潜
责任编辑	张雪霜
责任校对	王丽媛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130021
电 话	总编办:0431-86037598 发行科:0431-86037501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87
字 数	1 183 千字
版次印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1274-5
全套定价	189.00 元



作者 朱彤

作者简介

朱彤,1949年生于吉林省农安县。1968年毕业于九台师范学校;1983年东北师范大学中文本科函授毕业,获得学士学位;1996年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世界经济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曾先后任小学教师、中学教师、中学校长;通化市(县级市)文教办副主任、通化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通化地区妇联主任、通化市(地级市)教育局局长、通化市东昌区区委副书记、区长;白山市(原浑江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吉林省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现任吉林省政协常委、省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出版协会常务理事。

序 言

光阴荏苒，倏忽间朱彤同志也步入年逾花甲的老年行列。我和朱彤同志相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候，她是通化市教育局局长，在各种会议上，在同去基层调研中，这位风华正茂、干练务实的女局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她到通化市东昌区任区长，到白山市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副书记兼市长、市委书记，我们也常有工作上的接触，对她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朱彤在白山市的口碑很好，勤奋为政，孜孜不倦，踏实肯干，有谋有断，为人忠厚，作风正派，为白山的经济发展和进步做了很多好事实事。

在她调到吉林省新闻出版局任党组书记、局长之后，由于我与新闻出版界的渊源，加之我被聘为报刊审读小组的顾问，我和她接触就更多了。听她在报刊审读会上的即席讲话，在长白山文化研讨会上的论述，研究书稿抢救工作时的发言以及有时触景生情即席赋诗，我蓦然发现，朱彤还有些文采。“水怀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晖”，从她涉猎较广的文化修养和知识功底可以看出，她有藏而不露的“内秀”。

没想到，朱彤一下子写出四本书，有回忆录，有散文，有诗歌，有论说文，汇集起来名曰《朱彤文存》。在这文集即将付梓时，她邀我为之写序。坦白说，我已到退隐之年，不再像过去那样以提笔为乐了，而且谨遵“人之患在好为人序”的古训，故再三推辞。无奈，她恳切之情雅命难违。

我认真拜读了文集的部分文章，觉得，这些文字虽说不上是攸关宏旨之大作，而将散金碎玉汇聚起来也堪称洋洋大观的人生笔记，不仅自

得其乐,也具有立此存照的史料价值。人生是短暂的,人生的路程却又是漫长的。《朱彤文存》收录的文章最早写于1968年,最晚写于2012年。1968年朱彤还是一个未出校门的中专生,现在她已是即将告老还乡的人了。从时间跨度来看,长达40多年。一个人能40年如一日,利用学习、工作之余勤于笔耕记下自己的所历、所闻、所感,这种执着精神是值得称道的。文字是凝固的历史。文集记录了朱彤同志的人生历程,反映了一个共产党员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既是个人的履痕同时也留下了时代的印记。

读她的文章,能体味其朴实无华、不事雕琢,笔触细腻而不张扬的文风,应了“文如其人”那句话。回忆录忠实于已往的实事,不粉饰不隐讳,不做趋时赶潮的修改;散文没有华丽的词藻,不拘结构,如徐徐清风信笔道来;诗歌有意境不夸张,有激情无矫情,自然流露真挚的感怀;论说文针对实际不空泛议论,观点鲜明,自说自话。我这样品评,并非有意溢美这些文章有多么超凡的水平,而是说,作为一位从未搞过文字工作的行政干部,能够驾驭不同文体,这样凝神结思、文笔流畅地写出百万字不同体裁的文章,是难能可贵的。

朱彤同志的所有文章都表达了她的真情实感。由其从教、从政的经历出发,真诚、朴素地来述说对各种事物的认识,表达亲情、友情、乡情,可以说,文集多侧面地反映了她的思想积累和人生感悟。

党政领导干部,退出工作岗位之后能认真搞点文字钟情于写作,我是赞许的。希望朱彤同志人退休,笔不停,继续保持这种雅趣,开垦出一片新天地。

谷长春

2012年8月

《春华秋拾》之小序

本书是《朱彤文存》的第一部分，属回忆录。全册共收自己所写的文章 18 篇，附他人与我有关的文章 4 篇，共 22 篇。虽然总体上是回忆往事，但文章体例并不尽相同，有自传，有一般性散文，也有总结式的文章。篇幅长短也不一，有 2000 字左右的，也有 3 万多字的。由于成文时间不一，所以文章风格也不尽一致，但内容都是对往事的回忆，故此收到一册中。文章排序是按所写内容的时间进行排序的，并没按完稿时间进行排序。因为按所写内容的时间排序可以将我的成长历程和工作历程按时间顺序展现出来，读起来内容连贯。也有的文章表面不是写我自己，但能从侧面实际反映出我的一些情况。如《三十年前的记忆》写的是原九台师范校长袁纯嘏，但能反映出我在九台师范读书时的一些情况。又如《老部长马明》写的是当年通化市委组织部部长马明，但能反映出我任通化市委组织部部长前后的情况。在这些回忆文章里，记录的都是真人真事。只有个别地方为了更加稳妥，将真名隐去，但事情和时间都是准确无误的。我之所以写这些文章，是为了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一个总结、对自己的心灵有一个安慰。有的老同志说，出书一是安慰自己，二是留给后人，三是送给朋友。我觉得他说得很好，对于我恐怕主要是安慰自己，兼顾留给后人。也许若干年之后，这些文字会或多或少地发挥一点作用。

朱彤

2012 年 6 月 7 日

目 录

自传	1
我的小学	15
拾柴	20
农安三中	23
我们的“长征”	28
30年前的记忆	42
十九中的回忆	46
乡居	84
老部长马明	87
我的办公室	97
九个月的妇联工作	101
我终于到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了	117
我又坐在课桌旁	150
吃“天天”	154
开始学“做官”	156
白山市十年	171
我与吉林出版的情缘	210
我的离岗不退休生活	225
附 1 忠诚	245
附 2 老师 领导 大姐	261

附 3 姐弟情深	265
附 4 朱彤印象	274
后记	280

自 传

——1984 年应党组织要求所写

1949 年，我出生于吉林省农安县合隆乡朱家大屯。我的祖父朱洪玉是一个憨厚的庄稼人，他年轻的时候是给地主扛活的。祖母李万英则是一个慈善而精明的老人。祖父三儿三女，父亲朱岐山在祖父母的男孩中排行老二。在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是一个有十一二口人的大户人家了，也许是吃饭的人太多的缘故吧，当时家里比较贫寒。

1950 年前后，母亲李桂芝和父亲相继弃农为教。后来，他们都成了家乡有点名望的小学教师。因此，我应当是出身在农民兼小知识分子的家庭。

童 年

时间的逝去，可以使印象不深的东西从脑际消失。反之，那铭刻在心的记忆就更加清晰。记得在一个盛夏的傍晚，我和妈妈走在没人高的高粱地边，迎面走来一个十分英俊的海军战士。我新奇地望着，妈妈则准备侧身让路。没想到，那个战士来到妈妈面前，啪的一声，行了一个军礼：“李老师您好！”“哦，是你。”妈妈是那样惊喜。原来那是她的学生。我是第一次看到海军，也是第一次看到妈妈那样高兴。也许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感到妈妈的工作是神圣的。

我小时候是经常参加劳动的，无论是春种还是秋收，我都要贡献出一份力量。在一次摘豆角的时候，我和妹妹吵起来了，爸爸批评了我，并给我讲了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说姐妹之间应该互相爱护，不要像曹丕那样对待弟弟。听了爸爸教的诗，我觉得爸爸很有学问，从此常让他教我背一些小诗。那一次批评，竟成了我学诗的启蒙课，从此我便喜欢起诗

来。就是现在，我编顺口溜也要比别人快些。

爸爸妈妈给过我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家庭也存在很多矛盾。妈妈妯娌三个，我上有伯母，下有婶娘。不知道为什么，她们三个人总爱两个人组成统一战线，来孤立另一个人。孤立的对象并不固定，因事因时而变。我常常听到她们背后说对方的坏话，但我并不参与她们的战争，也从不传话。有时妈妈和婶娘吵起来了，我还照样帮助婶娘干活。妈妈说我傻，叫我傻丫头。可奶奶却说我好，说我懂事。母亲早已去世，伯母和婶娘一提起往事时，都夸我是全家最憨厚的一个孩子。父亲说我直到现在还保留着那股憨劲。

我考上了初中

我是1955年上的小学，1961年考的初中。那时候考初中太难了，一个村考上一两个，考上的家长会欢喜若狂。升学考试一过，我就开始帮家里割草、铲地，等待发榜。每逢傍晚，村里的人都要聚集在一起，谈论一阵子孩子升学的事。他们对每个考生都要品头论足，并要预言。我最怕这种议论，总是躲得远远的。发榜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考上了。全班45人，考上了5人，我是我们村唯一考上的一个。父母格外欢喜，我并不感到欢喜，但我再也不怕人们的议论了。

我的初中是在农安三中读完的，农安三中的前身是伪满时的国高，校舍宽敞，环境优美，师资也很好，我的很多知识是在那里学的。由于学校离家很远，我只有周六才回家。夏天的晚上，我做完功课，就坐在丁香树下、杨树林旁读我喜欢的课外书。鲁迅的《故事新编》、《三国演义》、《水浒传》、《春秋战国故事》、《青春之歌》、《苦菜花》……好多书，都是我在初中时代读完的。三中的老师，课讲得好，多少年后，我还记得老师那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表情。

1982年，我回到了阔别18年的母校——农安三中。没想到，她不像我记忆中那样美好了。她变得苍老了，十年动乱，在她的身上留下了很多创伤。当年的丁香花不见了，杨树林没有了。我真后悔，觉得不该去见她，不该让她的现实，抹掉我那美好的记忆。可是她毕竟是母校，我站在她身边流着眼泪：您的学生要亲手办好新的、更美的学

校。因为当时我正任通化市十九中学的校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4年，我从农安三中考入了九台师范。九台师范是一所新建的学校，课程设置除多开了教育学、心理学、美术、音乐之外，其余均和高中一样。校长袁纯嘏是一个教育行家，他治学严谨，育人有方。我在这个学校读完了二年级课程，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我这个十七八岁的学生，很难答上卷。记得，“文革”刚开始是1966年6月份，7月份便开始斗老师。我的班主任陈铭立是一位年轻教师，由于出身地主家庭，便成了挨斗的重点对象。同学们纷纷给老师提意见，写大字报，开他的批判会。

开始时，我虽不是主要角色，但也比较积极地给老师提意见。因为我认为这是革命，应当积极。没过几天，我便发现了问题。发现斗老师最积极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犯过错误被老师批评过的人；另一种是过去最“靠近”老师，曾取得老师信任的人。他们行动不公开，总是秘密策划，对待老师不实事求是，强加于莫须有的罪名。更使我气愤的是，有人竟然动手打老师。我认为，前一种人是疯狂的报复者，后一种人则是善于投机钻营的野心家。我不愿意和这些小丑同流合污，于是跳出激流。但批判会还是照样参加的，只是不再发言。故此，失去了当权者对我的信任，看大字报的差事也从不分给我。

后来开始划“红五类”和“黑五类”。我家是几代赤贫，我当然是“红五类”。不幸的是，我母亲家是地主，我又好像是“黑五类”。我的出身，决定了我的中间地位，于是乎，我也就甘愿当个“中间派”了。可是中间派是不能持久的，它只能给你观察和喘息的机会。过了一段时间，班级里彻底形成了两派。报复者和野心家是当然的“左派”；同情老师、主张实事求是的人变成了“右派”。我则一步迈进了“右派”营垒。

8月中旬，听说毛主席接见了北京市的红卫兵，大家便撇下老师不斗，跑到北京去看毛主席。去北京当然是“左”派优先了。他们说我有黑血，不准我去北京。这下我可火了：“我非去不可。中国的传

统不是看宗族吗？我是红色宗族的子孙！”“左”派们不知是驳不倒我呢，还是因为我无足轻重。于是我和大家一起赴京。8月30日到京，31日在天安门广场看见了毛主席。

当时北京也在搞“红五类”、“黑五类”、剪辫子、扒鞋的事。那时我虽然不成熟，但对这种形而上学的做法实在感到可笑。我就是在别人都剪辫子的时候留起的辫子。这也许是无声的抗议吧！说来也真得感谢“文化大革命”，不然我大概终生不会梳辫子。北京虽然有我感到不快的地方，但那里毕竟是祖国首都，加之在学校受些压抑的缘故，我很不喜欢回校闹革命，一直在北京住了近两个月。回忆起来，我对北京恐怕比对长春还要熟悉。

回校后，11月份传来大连海运学院15名同学步行赴京的消息。我听到之后很羡慕。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个14人的长征队。我给父母去了一封信，信上说：“若行千里路，胜读十年书。我要经风雨见世面去了。”

我们于12月15日从九台出发，开始了步行赴京的跋涉。老实说，这次长途旅行，我确实收获不小。我们沿途访问了当年四平攻坚战时的连长、长征时毛主席的警卫员（杨兴顺），塔山阻击战的幸存者朱国斌。我们进了山海关，登上了万里长城，浏览了北戴河海滨，看到了海上日出的壮丽景象。

我是长征队里的坚强者，我背着11公斤重的行李，沿途又买了很多书，行李不断加重，但我一步车没坐，用自己的双脚走了1000余公里，终于到达了祖国首都北京。我们1966年12月15日自九台出发，1967年2月4日抵京。一路上我们做了很多有益的事。吃饭自己拿钱和粮票，钱和粮票都是出发前准备好的。因为我们是师范学校，国家发伙食费，外出串联学校给拿钱。

这次赴京，我们在京住了20天左右。回校后，我回家住了一些时候。再返校，学校就形成了两大派。一派叫“红卫兵总部”，一派叫“造反大军”。两派互相攻击，各保其主，但表面上谁也不说保，各自开批判会。我参加了“造反大军”，是普通一员，从没参加过武斗，更没打过老师和校长。

两派互相斗口，一直到1967年8月份，形势开始紧张，有了武斗

的预兆，长春已经发生了武斗。这时我收到了家里发来的一份电报，说我祖母病危。我信以为真，接到电报马上回家。可回家一看，祖母好好的。便有些不高兴，说父母不该骗我回来，我不能在家逍遥，应当返回学校。这时最疼我的老祖母说了话：“孩子，平常搞文的革命你可以去参加，这打仗咱们可不能去，老实常常在呀……”这样，我被祖母留在家里，参加了生产队的秋收劳动。我在家住了4个多月，这4个多月正是学校学生杀向社会，进行武斗阶段。我感谢我的祖母，她让我一直住在她的身边，使我根本就没有看到那武斗的场面。

1968年春节后，我又返回了学校。学校大变样，图书库里的书被抢光了，同学们的东西也不见了，我的一些东西也无影无踪了。那些在社会上杀得疲倦的人不知哪里去了，听说有的进驻了县委大院，有的到了什么司令部。我则无事可做，因为晚了三春。于是我开始偷闲看点书。那个时期我学了好多古文，看了一些传记如：《恩格斯传》、《李清照传》、《奥斯特洛夫斯基传》……并亲手抄了《毛主席著作成语典故》一书，至今保存着。同时，我着手把步行串联时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散文，现在还剩一二。不久，两派开始联合，当时叫“复课闹革命”。正在两派联而不合的时候，1968年8月，我们毕业分配了。

如果说农安三中给我留下了美好的梦境，那么九台师范却叫我多思猛醒。

山城任教

人们都说，从学校毕业走向社会，恰似人生道路上的十字路口，应当看准方向。我到哪去呢？当时我坚信着这样一个道理：“有出息的人不要依靠父母。”我决计离家远走，走到什么地方呢？我忽然想起一首《山村女教师》的诗，那诗的第一句大约是：“推开窗子见山峦。”于是我在毕业分配自愿栏里写上了“通化市”三个字。

同学们听说我要去通化，都来劝阻我，缠得我没有办法，我想用一句有力量的话来回答她们。可是一时又没有适当的话，我就说：“哪里黄土不埋人”，话刚出口又觉得不妥，于是改口说：“青山处处埋忠骨”，这是《江姐》的一句唱词，真气人，我这两句话都是那么晦气。我

终于想出了一句满意的话：“种子何处不发芽？我决心把青春贡献给山城教育。你们不必劝了。”今天看来，这是多么十足的学生腔。可当时，我就是这样选择了我的工作地点，并且从没后悔过。

1968年8月30日，我到通化市教育局报到。之后被分配到通化市远郊——铁厂镇。我开始在铁厂小学工作，教三年级。这里不用推开窗子就可以见山峦。学校东边还有一条清澈的小河。

人生的路并不像理想中那样平坦。生活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异乡的为客难。当时正在“文革”中，学校领导班子不健全，关心我们这些年轻教师的人寥寥无几。我住在粮食宿舍里，曾差点被煤烟熏死。星期天、节假日，我是孤独的护校者，我饱尝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酸苦之情。同来的同学纷纷转回家乡。他（她）们来信说：“不要在通化山沟里受苦了，快回家乡吧！难道通化地区还比长春地区好吗？”我当时虽然还是一个不满20岁的女孩子，可我的性格并不懦弱。我没有要求转回家去，飞出窝的鸟要自己垒巢。

我碰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学生不听我管。记得课堂上在我回头往黑板写字的时候，一个叫于新刚的孩子就跳出窗外。老教师说：“朱彤讲课得不错，可惜管不住学生。”听了这话，我非常难过，但我没灰心。我暗暗地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他们批评学生时我偷着听，他们家访，我跟着去……后来，我终于能管住学生了。到中学以后，我竟成了一个模范教师。现在如果让我谈谈班级管理经验，我会滔滔不绝。同时，我也不再是异乡之客了，而成了通化市的市民。

1972年3月，我被推荐到通化市十九中学（地点在铁厂镇）教语文课。小学老师到中学，总有些怯阵，没想到我所教的三个班级的学生，都愿听我讲课，这大大鼓足了我讲课的干劲，我经常背着孩子批作文、写教案，直到深夜。

1973年，我开始做一个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并教两个班的语文课。就是在这一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班一共有36名学生，班长叫刘海森，团支部书记叫都本余。我教了他们一年多，如果从任课开始算是教了两年，1974年6月15日，把他们送出了学校。

在这个班同学的身上，可以说我做到了呕心沥血。为了讲好一堂

课，我要花费两天的工夫，为了开好一个班会，我要做出几个方案。晚上，我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去家访。学生外出劳动一周，我不放心，把吃奶的孩子扔在家里，和他们同吃同住。在大学“黄帅”的日子里，全校几乎都停了课，只有我们班还照常上课。说来也怪，在那个岁月里，我班同学竟没有一个给我写大字报的，除了给学校写了几张建议性的大字报外，也没有给其他老师写。我一直坚持着给他们补课，补古文、补历史、补政治。我很担心，团支部书记和班长会造我的反，没想到他们竟成了班级纪律的维护者。一天，一个叫李春仁的学生没背书包上学，他们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驳倒了李春仁。班级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学习环境。后来我问他们：“那时候，你们为什么不造反？”他们说：“你平时对我们的教育，使我们是对是非有了点辨别能力。再说我们的父母也一再嘱咐我们，千万别给你们老师写大字报哇，她可是一个好老师。”听了学生的话，我禁不住两行热泪流了下来。我开始领略到教师的辛苦、教师的光荣、教师的幸福。就是在教这个班的时候，我学会了做教师的本领，我也享受到了教师的快乐。

成家也是为了立业

既然写“自传”，不但要谈工作，也该说说生活。

我是一个早婚者，毕业后的第二年，我二十岁半的时候，就结了婚。为什么要结那么早的婚呢？这大概与我独在异乡为异客有关系。我丈夫王喜加通化市人，长我5岁，是一个比较像样的美术教员。当时丈夫家里很穷，婆母孀居多年，我们结婚时，3个小姑子都没成人。我们肩负着孝敬老人和抚养妹妹的责任。对于这门婚事，爸爸还算同意，可母亲却偷偷哭了几场。她不愿让女儿嫁给这样一个外乡人。可我们还是结婚了，我对丈夫很满意，因为他忠厚而通情达理。如果说当初我对丈夫满意，那么生活了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则为自己有一个丈夫而骄傲和自豪。他是那样地支持我的工作。我当班主任时，领学生到大堤上夜战（铁厂修堤改河道，学生义务劳动），他就在家哄孩子。谁都知道小孩晚上离开母亲要哭个没完的，丈夫就抱着孩子在大街上走，直到午夜。我当校长时，他是教师，学校搞一项活动，